

# 漫谈汉语词汇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周荐先生答客问

周 荐<sup>1,2</sup>, 李璐溪<sup>2</sup>

(1. 澳门理工学院 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澳门 999087; 2. 南开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汉语词汇学成立较晚, 迄今尚不足百年。虽已有前人工作的基奠, 但汉语词汇学理论发展依旧薄弱、滞后。因此, 学科定位、理论建树和方法探索就成为了该学科亟待解决的三大问题。周荐先生就汉语词汇研究提出了如下建议: 一是要注重对中国传统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继承, 对于西方理论则要坚持拿来主义, 审慎接收; 二是汉语词汇研究需要重视语料, 更要重视语料在历史中的延续性发展; 三是多借鉴早期西人传教士在汉语词汇研究和辞典编纂方面的成果。只有认清汉语事实, 吸收传统菁华, 追踪国外前沿, 才能使中国特色汉语词汇学得以真正的建立和发展。

**关键词:**汉语词汇学; 理论建树; 方法探索

**中图分类号:** H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039(2021)04-0091-06

**问者引言:**多年来, 周荐先生一直在词汇学领域潜心耕耘, 孜孜不懈, 成果斐然, 现已出版相关著作多部, 如《汉语词汇结构论》(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4年)、《词汇学词典学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4年)、《词汇论》(商务印书馆, 2016年)、《王云五评传: 多重历史镜像中的文化人》(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9年)、《汉语词汇和语文辞书问题探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2020年)等。周先生的研究涉域广泛、多元, 主张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去管窥汉语的词汇问题, 并始终坚守着“汉语词汇学中国化”这个基本盘, 致力于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路径。

汉语词汇学自20世纪50年代真正建立以来, 虽然道路崎岖, 但也成果颇丰。50年代, 孙常叙先生著就的《汉语词汇》是我国第一部汉语词汇学专著, 具有拓荒性质。虽因时代局限, 书中或还存在些许舛误, 但作为第一部汉语词汇学专著, 它为后人提供了思路, 指引了方向。约莫同时, 周祖谟先生写就的《汉语词汇讲话》先连载于《语文学》1955年第4期至1957年第10期, 后由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出版单行本。该书立足于共时层面, 讨论了现代汉语词汇中的一些典型问题, 如汉语的构词特征、词义发展、用词规范等。

20世纪80年代后, 我国又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词汇学家, 他们也都各有自己的代表作: 孙良明先生的《词义和释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2年), 此书虽非鸿篇巨制, 但却培育了不少词汇学人; 武占坤先生和王勤先生的《现代汉语词汇概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3年), 书中讨论问题广泛, 有不少观点为后来的一些《现代汉语》教材采纳; 葛本仪先生的《汉语词汇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5年)以及后来在前者研究基础上又稍作补充的《现代汉语词汇学》(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年)对汉语词汇学做了有益的探索; 符淮青先生的《现代汉语词汇》(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年)以描写见长, 对一些问题的分析也研精阐微; 刘叔新先生的《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 1990年)细致描写了汉语词汇面貌, 深刻总结了汉语词汇规律, 创建了一套全新的汉语词汇体系。除此以外, 关于词、熟语的研究, 有马国凡先生的《成语(修订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3年)、《歇后语》(马国凡与高歌东合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9年)、曹聪孙先生的《中国俗语典》(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1年); 关于词汇应用、词汇语义学、古汉语词义的研究, 有李行健先生的《词语学习与使用述要》(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8年)、张

收稿日期: 2020-05-08

**作者简介:**周荐(1957—), 男, 天津人, 文学博士, 澳门理工学院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璐溪(1993—), 女, 山东淄博人, 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志毅先生和张庆云先生合著的《词汇语义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陆宗达先生和王宁先生的《古汉语词义答问》(中华书局,2018年),都是对汉语词汇学建设的有价值的研究。不仅如此,一些本来不搞现代词汇学研究的学者,也分出了一些时间和精力去关注汉语词汇学的问题,如著名语言学家张清常先生早期致力于音韵学研究,后期则将研究的焦点转向了词汇,撰写了《胡同及其他——社会语言学的探索》(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年)、《北京街巷名称史话——社会语言学的再探索》(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将社会语言学、地名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著作。再如闽方言专家李如龙先生曾出版有《汉语词汇学论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这样的著作。像上述这样的学术前辈还有很多,有了这些前人的积淀,有了这样的学术基础,我们应该是可以做出自己的研究实绩来的。

然而,汉语词汇学目前的学术地位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汉语词汇学未来发展的命途是怎样,应当持有怎样的态度去搭建汉语词汇学的理论框架,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笔者聆听了周荐先生2020年8月在鲁东大学、11月在河北大学所作的关于词汇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讲座之后,约请他接受一次专访。周荐先生对笔者所提的问题一一给予了解答,他对汉语词汇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一些思考也尽现其中。现将谈话内容以问答的方式整理成文,以期对我们青年后学有所启发。

下面是问答摘要。

问:语言学中,词汇学一直以来都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您认为个中缘由是什么?

答:词汇学之所以不够受重视大概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研究内容和边界不够明晰,学科框架亟待优化。汉语的“词汇学”最初是把在前苏联语言学影响下设定的框架全盘接纳下来,沿用至今。但是沿用这一套,目前看来可能会使研究走入困境:比如词和语两者的边界究竟在哪儿?词典编纂中需要处理的义项分合与词汇学中探讨的义位关系的问题,二者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等等。20世纪中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欧美语言学和日本语言学影响到我国。欧美语言学有独立的词汇学,还有它的形态学。日本语言学的“形态论”框架中,一部分是构词法,一部分是引入认知语言学的心理词库。日本语言学和欧美

语言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到汉语词汇学界,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但它们的理论是否适合汉语,直到现在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第二,对传统继承不足,学科间的源流关系不清;对早期西人汉语词汇研究、辞典编纂的成果借鉴不够,研究缺失。比如明末,西来传教士著有大量的双语辞典、文法书、汉语教科书。西人关于汉语语音、语法的成果,已成研究热点,甚至可以说成为了汉语语言学的内容,而西人关于汉语词汇研究的成果,迄今少人问津,鲜有研究,颇为遗憾。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太少,成果做出来后没有及时进行归纳、总结,使之上升到理论层面的工作做得不够,严重滞后,这导致我们的汉语词汇学总是在袭用他人的理论,跟在他人之后亦步亦趋,自己的理论建设严重不足,百余年过去了,仍无成熟的、系统的汉语词汇学理论。这大概是汉语词汇学一直未受到应有重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问:记得您在《中国词汇学发展需明晰定位》(2010年5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一文中曾说过,看一个学科是否已然建立,或建设得完足,得把握住两个标尺:一是是否已有一套独立而又完备的理论和学科体系,二是是否已具备一定的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力。就词汇学的理论建设来说,现在很多人都说汉语词汇学没有理论,或理论基础薄弱,您是怎样看待这样的观点呢?

答:汉语词汇学没有理论,或理论基础薄弱,这话说得也对,也不对。

说它对,是因为在此方面我们做得的确还不够好:一是研究发轫晚,研究者不多;二是理论不系统,比较零散。“词汇学”在中国语言学界提出并不太晚,到今天应该也有百年左右的历史了。但是这个术语提出后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遭到冷遇,“汉语词汇学”更是被一些汉语学者置于“语法”中。比如现在我国台湾地区的一些论著中,词汇的内容就放在“文法”里谈。有的语言学教材,设“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章节,词汇学的相关内容就出现在“语义学”中。有的著作提“语汇”“语汇学”,不提“词汇”“词汇学”。甚至有学者将本属于词汇领域的熟语割离,单设一个“语汇学”,使之与“词汇学”分庭抗礼。同属著名学者,有些人的著作不提“词汇学”,如何九盈先生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有些人的著作提“词汇学”,如蒋绍愚先

生的《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15年)。这些问题的出现,或都与词汇学理论建设不足有极大的关系。凡一门学问,称为“学”,就必须有自己较悠久的历史和宏大的理论建树,否则它至多是一种“研究”。

而说它不对,是因为我们的汉语词汇理论自古代就已有雏形,只是当时还未加总结罢了。这话是孙良明先生说的,我是很赞同的。

问:既然如此,汉语词汇学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进行理论建树。本人习读了近期一些学者发表在权威期刊上的汉语词汇学论文,的确让人耳目一新。比如利用生成词库理论去分析汉语复合词的词义;从构式压制或事件强迫的角度去解释汉语复合词生成过程中的成员组合错配现象;更有主张从生成句法的视角来重新确定词的边界。这种运用西方理论来解释汉语问题的做法似乎已成了学术界的一种风气。不过,您认为这条路子是否能走得长久,它是否能完全适用于汉语词汇学的未来发展呢?

答:在汉语研究中我们提倡持“拿来主义”的态度。西方的语言理论有多少是适合汉语的,又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汉语,是需要我们仔细斟酌的。西方的方法和理论不可谓不重要,但是要适合我们自己才可以。比如西方语言学归纳出来的右侧中心理论,在多大程度上适合我们汉语复合词的分析,就很值得怀疑。再拿义素分析法来说吧,比如王洪君先生的论文《从两个同级义场代表单字的搭配异同看语义特征和语义层级——以“锅”和“碗”为例》(2018年收录进《生成词库理论与汉语研究》一书)就指出此法用于亲属称谓、军衔等封闭性的语义场效果不错,但是除了这极少的几个义场,用于其他语义场就很难获得成功了。再比如张志毅先生和解海江先生合作的面部语义场研究,题为《汉语面部语义场历史演变——兼论汉语词汇史研究方法论的转折》(《古汉语研究》1993年第4期),我认为这是国内语义场研究少数成功的案例之一。但是,如果一种方法只在很少量的地方有效,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使用,或者没有太大的效果,或者效果不如我们的预期,那么这种方法是否还值得我们如此珍视,就值得考虑了。

我特别希望能有新方法出现来解释汉语词汇的一些复杂问题。我们可以感受到,最近一段时期以来,语言学界的研究兴趣点已经出现了向词

汇倾斜的趋势,尤其是一些研究句法的学者,开始转向了词汇领域,例如宋作艳先生、董秀芳先生、施春宏先生、程工先生、邓盾先生等。他们所做的一些研究,比如就像你刚才说的运用生成词库理论对汉语、词汇语义进行研究,用构式的方法尝试对词的结构进行分析,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向。然而,一些学者表现出来的一个比较一致的特点就是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汉语的词汇现象。这样做当然值得赞赏。但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的理论是否能全盘适用汉语,是否能完美地解释汉语词汇问题。个别学者的论文或有这样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从理论出发,然后让汉语去迎合那个理论。更有甚者,有的文章的分析似乎是为了迁就西方的理论而给汉语造出某些东西来,而一些不合其理论的汉语现象就被弃置一旁,避而不谈,称为所谓的特例。这样的“特例”在汉语中并非少数,是否还可称之为“特例”,是值得研究的。用西方理论解释汉语现象时,汉语的词汇构成和结构是否真如西方理论所阐释的那样,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比如有位学者用形态学来分析“炒饭”这个词,两个组成成分都是没有词类的词根,这两个词根进行合并得到一个复合词根,复合词根再与一个零形式的名词类提供者合并生成一个复合名词。用这样的一种分析方法来解释“炒饭”的歧义现象,令人耳目一新,可问题是我们中国人实际在造“炒饭”这个词的时候真有这般复杂吗?当然,我是期望这些新的方法能够对解决汉语的实际问题提供更多的思路的。我主张,既然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包打天下,不妨让各种方法各显神通,各显身手,去解决问题。总之,学者们的探索是很有启发的,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汉语词汇学的理论建设也是有助益的。只是,在理论与语言事实的契合度上还需要我们继续探索。

问:明白您的意思了。也就是说我们对西方的理论还是要保持一个审慎的态度,要选择性地借鉴,而不能全盘接受。那么您觉得目前词汇学的建设除了要建构并夯实理论基础外,还应注意些什么呢?

答:我觉得现在的当务之急恐怕还是要将我们自己的家底摸清。词汇的面貌究竟如何?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做硕士论文的时候,曾经专门花了两年的时间对当时的《现代汉语词典》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统计。北京外国语大学朱京伟先生在《中日V+N动宾结构二字词的比较》

(载《关西大学视听觉教育》2006年第3期)一文中将野村雅昭先生对日语二字词的结构分析和我的硕士论文对汉语双字格复合词的结构分析进行了对比研究。野村先生是1988年做的研究,我的研究其实也是1988年完成的,只是正式收入论文集的时间是1991年。需要说明的是,日本上世纪电脑已经普及,野村先生是靠语料库来做的,而我当时完全是依靠手工统计。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呢?因为我当时心有所感。当年有一些老一辈的学者比较喜欢拿几个例子来证明一个观点,有的则是把别人的理论拿来再用汉语的几个例子证明一下,或者提出一个新的理论,然后用几个例子去论证一下。这样的研究其实是很容易被人推翻的。因为当你拿几个例子来证明某个事实是A时,别人或许就可以拿另外几个例子来证明这个事实是B。所以我当时做了个全盘的统计和摸底工作。我们现在最关键的事情还不是说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什么方法——当然这也很重要,但当务之急的还是要将我们自己的家底儿搞清楚。词汇的面貌究竟是怎么样的,这可是我们的基本盘。孙良明先生就是一位看重语料的德高望重的学者,他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去寻觅、梳理,尤其让人仰佩。另外,汉语词汇与其他语言的词汇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特别是同属汉字文化圈,又彼此深刻影响过的中日两种语言的词汇,究竟有多大程度的相同、多大程度的不同,也是要大量的语料分析的。我目前每年仍然会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放到语料的统计、分析上。因为如果你对我们自己的词汇面貌不甚了然,那么你对自己的语言其实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

未来我们似乎还是应该多考虑考虑,如何找准汉语词汇的特点和规律,多研究词汇学的中国化的问题。王宁先生对中国传统语言学理论论述深刻,她曾在《中国语言文字学面临的抉择》(《励耘语言学刊》,2017年第1期)一文中谈到,我们应当站在母语的立场上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切勿全盘西化,要讲求文化自信。王宁先生这话非常重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思潮浸入中华文化的序幕拉开,并首先通过语言文字这个媒介让中国接受西来的“上等文明”。从晚清就倡议的改汉字为拼音文字的主张,一直持续影响到了民国年间。中国的语言学也受到了西方语言理论的影响而朝着“形式化”和“抽象化”的方向发展,而属于我们汉语自己的文化元素却被长时间地忽

略。这种完全用西方语言学思想来解决汉语问题,或用汉语的例子来证明西方理论的做法在当今仍有遗存。面对着西方语言学和中国传统语言学相碰撞的事实,我们该如何选择?我想可以用王宁先生的一句话来总结——“语言学切勿脱离自己语言事实来套用西方既定的框架,切勿盲目抛弃传统精华”。西方的新理论、新方法,值得我们借鉴,但是一定要注意与汉语结合,要坚持“拿来主义”,要真能解决汉语的实际问题才行。词汇研究要想做得扎实,就必须先从语料抓起。语料是首位,其次才是理论。理论一定是在掌握充分语料的基础上才建立起来的。我们任何结论的得出,都要在大量材料论证之后。2003年我曾以慈禧太后的16字尊号为例探讨汉语词的构成问题。10余字的尊号,字与字之间有什么语法关系?我认为这只是字与字的“堆砌”而已。当然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不极端的也有很多,两个字的、三个字的、四个字的都有,它们字与字之间的关系,真的都如句法里词或短语间的关系吗?我看不尽然。后来董秀芳先生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叠加”的说法。我以为,我们还是应该根据汉语词汇的实际情况,去观察,去分析,而后得出切实的结论。

问:几十年前,一些学者特别强调分清共时和历时。那您觉得汉语词汇,从时间上看真的需要严格标示出现代的共时性吗?

答:索绪尔关于共时、历时的理论对我们影响深刻。有学者常将“共时”挂在嘴边,认为研究词汇学,现代就是现代,古代就是古代,近代就是近代,否则就是混淆了共时和历时的界限。其实,强调“共时”,并不是要我们自画藩篱,形而上学地去看待历史,看待语料,而是提醒我们在研究中不要将不同时代发生的事物对象不加分辨地混在一起。分析语料时,不一定要把时代划分得那么清,但是不混同却是十分紧要的。比如你研究《现代汉语词典》,这部词典里的很多词语并不是最近这100年,或者100多年才产生的,自画藩篱如何作研究?我们常挂在嘴边的一个术语是“现代汉语词汇学”。词汇学,上面已经说了,并非大家都认可它的存在,那么“现代汉语”呢?“现代”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如何正确地看待它?又是问题。

吕叔湘先生在《近代汉语指代词》(商务印书馆,2017年)一书的序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成古代汉语

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合适的。至于现代汉语,那只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不能跟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三足鼎立。”吕先生这个意见真的很精到。如果我们将唐代以来的语言材料进行分析,再对唐代以前的材料加以了解,你就不难看出这1000多年来,汉语,尤其是汉语词汇在变化,但是这个变化是渐变的,其样貌并没有发生彻底的改观。或者说,今日的汉语与唐代汉语的区别,远不如与中古、上古汉语的区别那样显著。

举个例子,我们今日的语言,与古代先贤口中的语言相比,俚俗得多。而这个俚俗的过程很早就已发端,唐代以来的俗化尤其值得我们关注。既然我们的语言从唐代至今一直是比较俚俗的,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必须要画地为牢,只研究这100多年的“现代”,有什么理由将这个“现代”从完整的“近代”中割取出来呢?前些年,还有学者发明了“当代汉语”这样一个术语。可是“当代汉语”研究的是什么时候的汉语呢?“当代汉语”和我们现在说的从《红楼梦》或《儿女英雄传》至今的“现代汉语”有什么实质的不同吗?我认为在研究中,时刻注意自己语料的时代性(比如某一个词何时产生、何时退出交际场合、何时发生异变)是很有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重视语料在历史长河中的延续性发展,千万不可任性割裂之。

问:前面您谈到汉语词汇与其他语言的词汇是有异同关系的,您能具体谈一下吗?

答:老实说,如今的世界并不存在一个与其他文明完全不相交融的另外一个灿烂文明。在基督教文明对中国发生影响之前,也有其他的外来宗教对中国产生过重要影响,如印度的佛教。这一点从造词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人们今天津津乐道的“佛、塔、僧、和尚、世界、圆寂、轮回、舍利、阿罗汉、无量寿佛”等词语,大都是东汉至隋唐佛教昌盛时造出的。

近代以来日本人用汉字创造的词成批地涌入汉语中。曾有人说,中国的现代汉语中有近70%的词是来自日本的外来词;还说离开日本外来词,中国人便无法说话。这话当然是夸张之语,并不正确。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近代以来的一些新词的确是拜日本所赐,例如“手术”“临床”“消防”“规范”“科学”“手续”“共产党”“社会主义”都是日本人用汉字所造而后回馈给中国的。除了来自日本的新词语外,还有一支,那就是来自西洋的新词语。来自西方的新词语除了音译词外,西

语词汇的结构方式对汉语的构词影响也不容低估,例如“在线”(online)、“会所”(clubhouse),等等。

来自西方的新词语,以往我们关注得较多的是自然科学的或有关社会的新词语,有一个小的支流似乎不应被忽略,那就是19世纪20年代基督教的马士曼和马礼逊在参考白日升《圣经》汉译本的同时,开始了创造基督教新词语的新历程。马士曼、马礼逊的《圣经》汉译本(俗称“二马译本”)所创制的《圣经》新词语,至今仍在广泛使用,如“弥撒、天使、上帝、教堂、福音、洗礼、教皇、礼拜、圣餐”(参考赵晓阳《域外资源与晚清语言运动:以〈圣经〉中译本为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以来华传教士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汉语研究的贡献是应该给予重视和肯定的。对汉语研究做出过贡献的传教士,如编字典的马礼逊、罗存德,研究汉语熟语的明恩溥、斯卡勃鲁斯,用罗马字注音方案为汉字注音的金尼阁,都不应被我们忘记,他们都为我们今天的汉语语言学的成立和发展作出过贡献。

问:的确是。在中西、中日的文化碰撞中,汉语词汇呈现出了最活跃的状态。在这种词汇创制、互借、交融的过程背后又折射出了一个时代的历史影像,这正是词汇的魅力所在。感谢您的回答。根据以上您的一些见解,最后还想向您请教,请问您认为汉语词汇学这门学科的未来发展趋势是怎样的,或者说您对汉语词汇学的未来发展有怎样的期望?

答:有一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譬如词汇和语法的异同究竟何在?词汇学和语法学的界限到底在哪里?这是需要我们回答,也是不能不回答的重大原则问题。按照语言学的经典说法,语法分为词法和句法,而“词法”的定义是“词的构成和变化的规则”。这里说的“构成”,这里说的“变化”,有多少真正是该语法学去解决的,又有多少本该是由词汇学来做的,迄今无人说清,所以个别汉语教材中就出现了词汇结构问题语法章节也谈、词汇章节也说的重复场景。当然,张公帽儿李公戴,问题就愈发扯不清了。再如我们常听人说:“词汇,是词和语的总汇”。问题是,我们所面对的,也是需探讨的,是语言在一个共时平面上的词汇量的最大值究竟是怎样的,是如何形成的,在形成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江蓝生先生主持的《现代汉语大词典》,收条

虽远超《现代汉语词典》,但它仍是共时平面上的词语总汇。那么,同样是词语总汇,两部词典收条量差距如此之大,原因何在,就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了。词汇共时的研究不能与历时的研究割裂开来,词汇纵向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如词汇发展演变的机制,词汇来源中新质成分的增添、旧质成分的消隐,词汇发展中异文化的影响,时代因素的作用,地域因素的阻限和推动,都存在着共时、历时的交叉和互动,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对汉语词汇学的未来发展大致有三点期望。第一,汉语词汇学应当朝向一种更具本土性、科学性的方向发展,要始终立足并落脚于汉语事实,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借鉴西方的新理论。惟其如此,理论完善、体系完整的汉语词汇学的问世,乃可期待。我以为,汉语词汇学虽要不断进行理论建构,但这种理论的建构,必须建立在扎扎实实的语料搜集、整理、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它需要一个过程,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不可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性急心理,要踏踏实实去做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完成的工作。第二,汉语词汇学应当注重对中国传统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优秀的东西,我们必须加以继承、

弘扬。对于汉语词汇学而言,传统小学中的训诂学,就有非常值得借鉴的东西。不要一沾“训诂学”就斥之为“非语言学”,将其一棍子打死。训诂学若非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也不会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两千年生生不已。第三,要多借鉴早期西人传教士在汉语词汇研究和辞典编纂方面的成果。现在一些汉语词汇学论著似乎欠缺对传教士材料的介绍,或强调不够。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各类学科术语的创制、中国新式辞书的开创与发展,都与传教士当年的贡献不无关系。近年来已经有一些学者将目光投向了此领域,但研究成果还远远不够,尚需继续深入。

汉语词汇学正处于重要的发展期,我们要对中国特色的汉语词汇学理论的建立有充分的自信。这个自信不是盲目的,它是在充分认识、深入了解自己母语的词汇事实,不忘优秀传统文化的初心,时刻跟踪、密切关注国外词汇学理论的发展动态,利用一切研究资源、手段和成果的基础上实现的。只要广大汉语词汇学者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将汉语词汇学推上一个新的台阶,高质量地完成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

## Discussion on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Chinese Vocabulary Research: Mr. Zhou Jian's Answering the Guest's Questions

ZHOU Jian<sup>1,2</sup>, LI Luxi<sup>2</sup>

(1. Language and Culture Research Centre of Macao, Macao Polytechnic Institute, Macao 999078, China;

2.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Chinese lexicology has so far existed for less than a century. Although the foundation for the work of predecessors has been establish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exicology theory is still weak and lagging behind. Therefore, the subject orientation,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and method exploration have become the three major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Mr. Zhou Jian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or Chinese vocabulary research. 1.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nguistic theories and methods, and accept western theories carefully. 2.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corpus,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orpus in history. 3. We should learn more from the early western missionaries' achievements in Chinese vocabulary research and dictionary compilation. Only by recognizing Chinese facts, absorbing traditional elites, and tracking foreign frontiers, can lexic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 truly established and developed.

**Key words:** Chinese lexicology; theory achievement; method exploration

(责任编辑 梅 孜)